

清代福建人向海峡殖民地的移民*

王付兵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福建人移民海峡殖民地的历史颇早。海峡殖民地是清代尤其晚清福建人移民马来亚的集中地。在海峡殖民地各华人方言群中,除了1911年马六甲海南人比福建人略多之外,福建人所占的比重都是最大的。按人数看,19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的福建人在马来亚各邦和各殖民地的福建人中占绝对多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建人的儿童移民数远超过其他方言群及国籍的儿童移民,从厦门港出发移民槟榔屿和新加坡的福建人绝大多数是男性移民。1893年清朝廷正式废除海禁政策对福建人经厦门港移民海峡殖民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福建人;移民;海峡殖民地;方言群

中图分类号: D6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09)02-0065-10

英国殖民者分别于1786年和1819年在槟榔屿和新加坡建立殖民地,1824年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1826年成立海峡殖民地,为清代中国人移民马来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那些在海峡殖民地积累了资本并成功地创办了企业的华商将其活动拓展到马来半岛内地各邦,卢骨、双溪乌戎、吉隆坡、拿律、新山和麻坡等地因而得到开发,迫切需要大批就业者。受中国国内人口过剩,自然灾害,战乱,地主、高利贷者和官吏剥削等因素的影响,清代大量的中国人移民马来亚。

根据所搜集的文献,本文尝试对清代尤其晚清福建人向海峡殖民地移民这一历史过程进行

* 收稿日期:2009-02-08

作者简介:王付兵,男,福建漳平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在职博士生。

学术界一般把英国殖民者控制的马来半岛部分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称为马来亚。

关于中国人移民马来亚的原因,可参阅:Yen Ching-hw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

传统上,东南亚官方——殖民当局或原住民统治当局按籍贯和方言原则将东南亚华人社会分为五大方言群:福建人、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在东南亚华人历史发展中,福建人长期以来是指来自闽南漳、厦、泉地区的人民。

大致的勾画 ,以期从一个侧面较客观地认识清代尤其晚清中国人向马来亚移民的状况。

一、福建人向马六甲的移民

15 世纪初满刺加国建立后 ,中国人就陆续在马六甲定居。当时马六甲大部分的中国商人应是来自福建漳州等闽南沿海地区。葡萄牙殖民者统治马六甲时期 (1511 至 1641 年) ,马六甲的华人人口持续增加 ,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社区。^[1]根据 17 世纪初在马六甲居住的葡萄牙籍航海家狄伊勒地亚 (de Eredia) 对马六甲“ 华人村落 ”的描述 ,可知当时已有不少漳州人在马六甲居住。^[2]

表 1 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一览表

	姓名	生卒年	籍贯	备注
第一任	郑启基	1572 - 1617	福建漳州	又名郑明弘 ,号芳扬 ,青云亭创办人之一
第二任	Notchin	未详		其中文名不详。荷兰文档案写为 Nootsian
第三任	Si Sia			1678 年马六甲太守 (Governor) 蒲脱 (Balthasar Bort) 明言 :1678 年华人甲必丹为 Si Sia。其中文名不详。他可能只任甲必丹数年 ,1680 年初期便由李为经所继承。疑其在 1685 年便已离开马六甲或去世。
第四任	李为经	1612 - 1688	福建同安	字宏纶 ,号为经常 ,青云亭创办人之一 ,出资购买三宝山 ,并且划归青云亭管辖 ,作为华人的公墓。
第五任	李正壕	1662 - 1708	福建同安	字仲坚 ,为李为经之子。
第六任	曾其禄	1643 - 1718	福建厦门	字伯中 ,因排行第六 ,被称为“ 六官 ”,为李正壕的妹夫。
第七任	Chan Jamqua			Chan Jam 应是曾其禄之子应菊的英文姓名。qua 为闽南话“ 官 ”或“ 观 ”,即现在的“ 君 ”之义。
第八任	未详			疑为曾姓之人
第九任	曾宪魁	1725 - 1765		乳名照官。
第十任	陈承阳	1703 - 1784	福建厦门	
第十一任	陈起厚	1748 - 1794		又名德馨。
第十二任	蔡士章	1750 - 1802	福建海澄	又名乔 ,字端甫。
第十三任	曾有亮	1771 - 1822		又名专一。
第十四任	曾佛霖	1793 - 1874		世芳大概是其字或号。1828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终止甲必丹制度。

资料来源 :许云樵著 :《中华民族拓殖马来半岛考》,见《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 ,1977 年 ,第 534 - 537 页 ;黄存燊著 ,张清江译 :《华人甲必丹》,新加坡 :国家语文局 ,1965 年 ,第 1 - 11 页 ;陈铁凡、傅吾康合编 :《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 ,吉隆坡 :马来西亚大学出版部 ,1982 年 ,第 389 页 ;郑良树著 :《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 (卷二)》,新加坡 :南洋学会 ,1986 年 ,第 1 - 28 页 ;庄钦永著 :《新呷华人史新考》,新加坡 :南洋学会 ,1990 年 ,第 7 - 43 页 ;林远辉、张应龙著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第 83 页。

有关这段时期福建人向马来亚移民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许云樵《中华民族拓殖马来半岛考》;Yen Ching-hwang(颜清滢)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 —1911* 及其论文《福建人在马新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麦留芳著《方言群认同 :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和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林远辉、张应龙著《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等。受文献不足的限制 ,学术界对 1786 至 1911 年福建人向海峡殖民地移民的研究较为薄弱。

1641 年到 1824 年马六甲为荷兰占领(其中 1795 年至 1818 年为英国人代管),这期间福建人移民马六甲的人数有所增加。

明末清初之际,那些不愿成为清朝臣民的志士纷纷移民海外,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抵达马六甲,“他们大部分来自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3]1683 年台湾的郑氏政权抗清失败后,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到马六甲。他们中的大部分毫无疑问是来自福建的厦门、泉州和漳州。这些反清人士如福建厦门籍的甲必丹李为经、其女婿甲必丹曾其禄(亦福建厦门籍)抵达马六甲,对于在当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华人社区并使其保持高程度的中国文化有很大的贡献。^[4]

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福建永春丰山陈臣留到马六甲谋生。据说陈氏善用中草药治病,曾治好苏丹(原文如此,疑有误)之妻的绝症,苏丹便赐予他大片土地以供开垦。陈氏因此回国带了数百名亲友同乡来马六甲从事种植。^[5]

18 世纪末谢清高在其口述的著作《海录》中提到:“闽粤人至此(指马六甲)采锡及贸易者甚众”。^[6]可见当时已有一定数量的福建人向马六甲移民。

葡、荷占领时期的马六甲,由于那里的福建人较多,殖民者便让华人甲必丹负责管理马六甲华人居住的村落。从现有的文献记载看,知道其确切籍贯的马六甲华人甲必丹都是福建人(表 1)。

马六甲是福建人的发祥之地,华人社会领导权一直掌握在福建人手中。除上述提到的福建人被委任为甲必丹以外,它还体现于 1825 年英国人废除甲必丹制度后福建人对成为马六甲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即青云亭的控制上(详见表 2)。

表 2 1825 - 1915 年马六甲青云亭亭主系谱表

亭主姓名	在任时间	籍贯	备注
梁美吉	1825 - 1839	福建南安	薛佛记之三妹夫。1825 年英人废除甲必丹制度,同年马六甲华社设置青云亭亭主来取代马六甲的领导地位。
薛佛记	1839 - 1847	福建漳浦	1828 年创建新加坡恒山亭
陈金声	1847 - 1864	福建永春	薛佛记的姻亲
陈明水	1864 - 1884	福建永春	陈金声之子,薛佛记之女婿。
陈明若	1884 - 1893	福建永春	陈金声之子,陈明水之弟。
陈若淮	1893 - 1915	福建永春	陈明水之子

资料来源:林孝胜:《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载林孝胜著:《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 年,第 36 - 37 页。

从表 2 可以看出,1847 年始,永春人占据了青云亭亭主的位置。这反映了马六甲永春人势力的强大。

马六甲永春会馆、马六甲福建会馆(1801 年成立)是马来亚最早成立的几个会馆。这大体上反映了福建人较早移民马六甲且在马六甲具有一定数量的历史事实。

大体而言,荷兰统治马六甲期间,马六甲的华人人口不多,增长很慢,1750 年最高峰时也不过 2 161 人,为荷兰统治马六甲初期华人估计数的 5 倍。^[7]英国统治马六甲后,至 1911 年,除 1860 年至 1871 年的 11 年内,因华人迁移到其他更具吸引力的地区而大减之外,马六甲华人人数呈缓慢、稳定

直至最近几年,人们才认为马六甲永春会馆成立于 1800 年。参阅陈清水:《发刊词》,载《马六甲永春会馆二百周年纪念特刊(1800 - 2000)》,2000 年,第 9 页。

增长的态势。华人 1825 年有 3 828 人;1830 年有 6 555 人;1836 有 13 749 人;1840 年有 17 704 人;1849 年有 29 988 人;1860 年有 50 043 人;1871 年有 13 456 人;1881 年有 19 622 人;1891 年有 17 893 人;1901 年有 18 863 人;1911 年有 29 888 人。^[8]

海峡殖民地的官方人口普查始于 1871 年,但以方言群 来区分华人人口的人口普查在马六甲和槟榔屿两个地方却始于 1881 年,在新加坡则迟至 1891 年。根据海峡殖民地官方每隔 10 年所进行的人口普查,1881 至 1911 年马六甲的福建人在各华人方言群中的人口比例如下:1881 年福建人占华人总人口 19 622 人的 49%(包含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27%的侨生),在各华人方言群中占第一位;1891 年福建人占华人总人口 17 893 人的 54%(包含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28%的侨生),在各华人方言群中仍占第一位;1901 年福建人占华人总人口 18 863 人的 55%(包含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26%的侨生),在各华人方言群中还是占第一位;1911 年福建人占华人总人口 29 888 人的 32%,在各华人方言群中占第二位,比海南人(占华人总人口的 34%)略少了 2%。

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可以算出 1881 至 1911 年福建人的人数为:1881 年约 9 615 人;1891 年约 9 662 人;1901 年约 10 375 人;1911 年约 9 564 人。4 年平均每年约 9 804 人。

二、福建人向槟榔屿的移民

1786 年 8 月英国占领槟榔屿 时,岛上只有 58 名居民。^[9]占领槟榔屿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弗兰西斯 莱特(Captain Francis Light)在槟榔屿实施自由贸易政策,极力鼓励华人移居槟榔屿,从而吸引了大批华人从邻近的港埠及中国东南沿海港口涌向槟榔屿,华人移民马来亚的人数大增。到了 1794 年,岛上华人已增加到 3 000 人。^[10]到 1800 年,英国的槟榔屿殖民地又加上了陆地上一块狭长土地——威斯利省。尽管移民人数增加,但是槟榔屿的存在和发展极不稳固。到 19 世纪 20 年代,它就完全落后于新加坡了。后来由于甘蔗的种植及马来亚内陆地区锡矿业、橡胶业的发展,槟榔屿又繁荣起来。^[11]从总趋势上看,槟榔屿的华人人口数量呈持续递增趋势。

福建人移民槟榔屿的人数不少,在华人五大方言群中居于首位。18 世纪末移民槟榔屿的福建人来自 3 个地方:一部分是当时已在泰国南部立足的福建商人从吉打南下,如在 1786 年 8 月弗兰西斯 莱特占据槟榔屿 7 天之后,祖籍福建泉州府同安、槟榔屿最早的华人甲必丹辜礼欢 率领族人辗转从泰国到吉打进而定居在槟榔屿;另一部分是从马来半岛的福建人发祥地马六甲北上;还有一部分是来自闽南^[12],如槟城早期的五大姓氏——谢、邱、杨、林和陈的族人均来自漳州府的海澄

海峡殖民地官方将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方言群分为七大类:福建人、侨生(大部分为福建人的后代)、广府人、海南人、客家人、潮州人和其他。关于 1881 至 1911 年马六甲各华人方言群的具体分布情况,请参阅 Mak Lau Fong (麦留芳),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 p. 81.

“槟榔屿”乃福建人对该地的通称,以其曾盛产椰子故名。广府人称之为“庇能”,即英文 Penang 之译音。英人及英文地理书,常称其为威尔士太子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是因为槟榔屿并入英国之日,恰逢英皇太子威尔士(Prince of Wales)诞辰日。吉打附近的马来人称槟榔屿为丹绒(Tanjong)。华人社会所称的“槟城”,即英人所称的乔治城(Georgetown),位于槟榔屿之东北脚。

槟榔屿华人数量的具体增长情况,请参阅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 232.

辜礼欢之父原名是陈敦源,系清代乾隆间同安翔凤里十二都浦尾村人,因性情急躁,又极嗜酒,致家道中落。终因酒后与村边乞丐营里的一名乞丐争执,失手伤了人命。夜里酒醒心惊,害怕官府缉拿,迅即携带家眷,摇着自家小渔船南逃海外,辗转到了马来亚吉打,登陆落户,成为当地华人的先驱,时间比英国殖民者入侵马来半岛还早数十年。事过境迁,陈敦源背乡离井,痛定思痛,负疚后悔不已,难以释怀,遂改“陈”为“辜”,以示忏悔之情,从此子孙皆为辜姓。陈敦源之子即辜礼欢。参阅陈金城、陈荣林:《辜鸿铭本姓陈,祖籍同安浦尾村》,http: www. fjql. org/ qszl/ xsyj6. html.

县^[13],他们主要在 19 世纪初期从闽南大批地移居槟城。^[14]1848 年成书的《瀛寰志略》虽未明确提到槟榔屿的福建人最多,但它提到福建人数不少。据其记载,“(槟榔屿)居民五万四千,闽、广人居五分之一。”^[15]即至 1848 年福建人约有 1 万人。清代康熙至咸丰年间(1662 - 1861 年),厦门海沧石塘(当时属海澄县的一部分)谢氏族往南洋谋生最多的地方是槟城,有 110 人葬在槟城。^[16]约成书于光绪十七年(1891 年)的《槟榔屿志略》记载:《外国史略》提到,“槟榔屿居民‘五万一千,日增月盛,四方云集,福建人尤多’。”^[17]该书又记载:《槟榔屿纪略》提到,“光绪七年辛巳(1881 年)人民一十万零五百九十七口,内有华人六万七千八百二十,计居槟榔屿者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五,居威烈斯烈(笔者按,指威斯利)者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九,居颠顶(笔者按,指天定)者四百六十六,其居槟榔屿者计福建人一万三千八百八十八,海南人二千一百二十九,客籍人四千五百九十一,广府人九千九百九十,潮州人五千三百三十五,土生华人九千二百零二,其居威烈斯烈者福建人二千六百八十,海南人三百八十二,客籍人二千三百一十二,广府人二千一百一十二,潮州人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八,土生华人一千二百七十五。”^[18]这段史料告诉我们,1881 年时在槟榔屿华人当中(包括威斯利省在内),福建人人数最多,达到 16 568 人,占华人总数 67 354 人的 24.6%,接近当地华人总数的 1/4。如果加上土生华人(主要为福建人),比例将会更高一些。

海峡殖民地华民护卫司(Protector of Chinese)1894 至 1904 年各年度报告显示,在绝大多数年份中,从厦门港口出发移民槟榔屿的人数比从香港、汕头、海南、上海、北海等中国其他港口移民槟榔屿的人数要多。从厦门港移民到槟榔屿的华人人数(大多数应为福建人)11 年合计 155 371 人,年均约移民 14 125 人。其中男性移民 139 259 人,占 89.6%,年均约 12 660 人(详见表 3)。

表 3 1879 至 1904 年从厦门港口出发抵达槟榔屿的中国移民数 (单位:人)

年份	男性	女性	儿童	总计
1894	10 001	474	445	10 920
1895	11 336	445	582	12 363
1896	12 092	662	865	13 619
1897	7 849	448	457	8 754
1898	9 897	565	622	11 084
1899	11 593	599	960	13 152
1900	14 889	618	905	16 412
1901	13 788	644	1 077	15 509
1902	15 445	789	1 051	17 285
1903	16 330	650	1 175	18 155
1904	16 039	799	1 280	18 118

注:移民到槟榔屿的人数实际上还有一小部分人再从槟榔屿移民到其他地方,如加尔各答、日里、仰光、巴东、孟买等。

资料来源:Annual Reports on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4-1904.

聂德宁认为,从书首作者所作的“自识”来判断,该书出版时间应在光绪辛卯年(1891 年)。参阅聂德宁:《〈槟榔屿志略〉与槟城华侨史料》,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65 页。

林猷鹤(Lim Joo Hock)认为,1853 年前海峡殖民地似乎不曾有中国女性移民。直到 1853 年,中国女性移民才被英国官员第一次注意。参阅:Lim Joo Hock,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in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60-1901*, in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南洋学报》), Volume 22, Singapore, 1969, p. 62.

根据海峡殖民地华民护卫司 1894 年至 1904 年各年度报告统计,这 11 年间从各地移入槟榔屿的福建人女性移民合计 8 426 人, ,年均约 766 人;福建人儿童移民合计 11 692 人,年均约 1 063 人。到达槟榔屿的这些移民的目的地绝大多数槟榔屿。其中福建人儿童移民远比其他各方言群、各国籍的儿童移民多,占 46.9 %。如果包括侨生(11 年合计 113 人),则占 47.4 %(详见表 4)。

表 4 1894 至 1904 年各地抵达槟榔屿的福建人儿童移民人数情况

年份	福建人的儿童移民 人数(单位:人)	占各方言群、各国籍 儿童移民总额的 %	年份	福建人的儿童移民人数 (单位:人)	占各方言群、各国籍 儿童移民总额的 %
1894	597	49.8 %	1900	1 098	46.5 %
1895	776	43.7 %	1901	1 352	47.4 %
1896	1 093	51.3 %	1902	1 318	51.5 %
1897	527	35.7 %	1903	1 593	43.7 %
1898	617	33.9 %	1904	1 539	50.2 %
1899	1 182	58.4 %	合计	11 692	46.9 %

资料来源: *Annual Reports on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4-1904.*

海峡殖民地官方从 1881 年开始的每隔 10 年一次以方言群来区分槟榔屿的华人人口普查结果揭示了 1881 至 1911 年槟榔屿的福建人(含侨生或称土生华人)占当地华人总数的大致比例:1881 年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46 810 人的 50 %(包含当地华人总人口 20 %的侨生);1891 年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63 086 人的 55 %(包含当地华人总人口 23 %的侨生);1901 年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70 853 人的 61 %(包含当地华人总人口 26 %的侨生);1911 年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69 253 人的 60 %。在这 4 个年份中,福建人的人数在每年均比槟榔屿华人各大方言群多,占槟榔屿华人总数的一半或一半以上,1901、1911 两年则达到或超过 60 %。

根据海峡殖民地华民护卫司的人口普查数字,可以算出 1881 年至 1911 年槟榔屿(未含威斯利省)福建人的人数为:1881 年 23 405 人、1891 年约 34 697 人、1901 年 43 220 人、1911 年约 41 522 人。4 年平均每年约 35 711 人。

三、福建人向新加坡的移民

据纽博特海军上校(Captain Newbold)记载,1819 年 1 月英国殖民者莱佛士(Stanford Raffles)登上新加坡岛时,岛上只有 150 人,其中华人 30 人,其他均是马来人。^[19]这份人口记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那时新加坡的居民估计有 300 名至 500 名之间,莱佛士等人说的 150 名居民,可能只是限于新加坡河口附近的人数。^[20]

其中 1894 年 560 人、1895 年 548 人、1896 年 780 人、1897 年 471 人、1898 年 609 人、1897 年 471 人、1898 年 609 人、1899 年 781 人、1900 年 762 人、1901 年 852 人、1902 年 1026 人、1903 年 963 人、1904 年 1075 人。请参阅 *Annual Reports on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4-1904.*

这里的槟榔屿华人人口总数未含威斯利省。关于槟榔屿华人各方言群的具体分布情况,请参阅 Mak Lau Fo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 p. 81。

《槟榔屿纪略》提到,1881 年槟榔屿(不包括威斯利省)的福建人是 23 090 人(含侨生在内)。请参阅力钧著:《槟榔屿志略》,卷四,“流寓志”,第 7 - 8 页。

早期的新加坡华人大概是从马六甲和新加坡附近的廖内岛来的。在新加坡早期华人史中,最显赫的华人都是马六甲居民。^[21]新加坡人口增长很快。据莱佛士所言,至1819年6月,人口已增至5 000多人,主要是华人。^[22]莱佛士可能言过其实,但新加坡人口的急剧增长当属事实。新加坡开埠后,何时会有中国移民涌入?我们缺乏可靠的证据来说明。我们所见到的记载是,法夸尔上校(Col. Farquar)在1820年3月31日写给莱佛士的信中介绍:“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这个新殖民地商业上日见兴盛和普遍繁荣相比拟的了。真的,现在只要放眼望望我们这个海港,上游就有20只大帆船,其中3只是来自中国,……”^[23]1821年2月,来自厦门的第一艘帆船抵达新加坡。上述两处均没提到是否载来中国移民。

至1823年,赊单制(Credit-ticket System) 在新加坡出现,引起了莱佛士的注意,并试图对它的弊端加以控制。^[24]可见当时已有不少中国南方移民通过赊单制这种移民方式坐船抵达新加坡。此后陆续有船从中国南部福建、广东、海南的港口来新加坡,中国南部的人民不断涌入,新加坡的华人人口逐步上升。据估计,1824年有华人3 317人,1830年增至6 555人。到1836年,华人人口进一步增长,达到13 479人,第一次超越马来人口(12 487人),成为新加坡人口最多的族群,奠定了新加坡华人人口占大多数的格局。^[25]

鸦片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华人人口跳跃式地激增。从19世纪50年代起的几十年内,每年来到新加坡的华人都在增加。^[26]新加坡华人1840年有17 179人;1845年有32 132人;1860年有50 043人;1871年有54 572人;1881年有86 766人;1891年有106 643人;1901年有164 041人;1911年有207 413人。^[27]

新加坡的华人主要是漳、厦、泉一带的福建人。早期新加坡的福建人主要是经商。18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柔佛苏丹及天猛公谈判,把新加坡的主权割让给英国,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并被开辟为自由港,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允许商人自由买卖。一些福建商人由此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如漳州海澄籍的陈笃生(1789 - 1850年),出生在马六甲的永春籍的陈金声(1805 - 1864年),漳州漳浦籍的薛佛记(1793 - 1847年),漳州海澄籍的蔡沧浪(1788 - 1838年)等。^[28]稍后,从厦门港前往新加坡的福建人也逐年增加。1827年,在新加坡殖民局发给华人民居的租地契约中,已出现厦门街这一地名。1829年至1830年,从厦门启航的4艘商船共搭载1 570多人前往新加坡。1831年,又有两艘商船搭载货物和移民进入新加坡港。^[29]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到福建大量拐骗、掳掠和贩卖华工,厦门成为闽南华工出国的中心,地处东西航道的新加坡成为贩运华工的中转站。漳、厦、泉人大量被西方殖民者从闽南沿海拐骗、掳掠和贩卖到新加坡,自由华工也不断增多。^[30]

根据搜集到的海峡殖民地华民护卫司1877 - 1904年各年度统计报告,从厦门港出发抵达新加坡的中国移民数1880 - 1886年合计为173 332人(其中1880年17 681人、1881年18 253人、1882年缺、1883年30 702人、1884年34 459人、1885年37 778人、1886年34 459人),年均约28 889人;1894

赊单制是中国人移民新马的一种类型。许多希望移民的中国人因为贫困,无力支付出国的船资,于是便先由客头、帆船船长或劳工代理商垫付这些船资。待抵达新加坡或檳城后,这些赊单的移民便被转卖到需要劳动力来开垦种植园或开采矿石的雇主手中,雇主则将这些移民所需支付的船资付给劳工掮客,并与这些移民达成口头协议或签订书面合同,规定用劳动来补偿其债务。在做完规定年限的工作之后,赊单的移民就可从其债务中解脱出来。赊单制在19世纪极为普遍,是造成大量中国人移民新马的重要原因。参阅Yen Ching-hw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pp. 4-5.

根据族谱记载,在清代,至迟在乾隆(1736 - 1795)年间已有零星的福建人移民新加坡。参阅庄为玑、郑山玉:《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第228、814页;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载《南洋研究所集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1958年,第23 - 24页;李勇:《侨乡族谱在华人方言族群移民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论文(未刊),暨南大学,2009年5月9日至11日,第3页。

- 1904 年合计为 705 481 人,年均约 64 135 人。其中 1894 年至 1904 年的男性移民数合计为 636 633 人,年均约 57 876 人,占同期中国移民数的 90.2%(详见表 5)。

表 5 1899 - 1904 年从厦门港口出发抵达新加坡的中国移民数(单位:人)

年份	男性	女性	儿童	总计
1894	47 961	1 516	1 949	51 426
1895	61 907	1 557	2 712	6 685
1896	57 809	2 054	3 059	62 922
1897	34 086	1 646	2 030	37 762
1898	44 620	2 318	3 195	50 133
1899	53 074	2 342	3 907	59 323
1900	70 231	2 966	4 800	77 997
1901	62 736	2 815	4 605	70 156
1902	72 790	3 365	5 523	81 678
1903	69 199	3 336	5 355	77 890
1904	62 220	3 045	4 744	70 009

资料来源: *Annual Reports on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4-1904.

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人(根据海峡殖民地华民护卫司年度报告,约为 21% - 23%)再从新加坡港移民到槟榔屿等地。从厦门港出发抵达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大多数是福建人。根据海峡殖民地华民护卫司 1877 年至 1904 年各年度报告,在绝大多数年份中,从厦门港出发的中国移民从 1894 年起比从香港、汕头、上海、海南、北海等其他中国港口出发的中国移民多。

笔者根据海峡殖民地华民护卫司 1894 年至 1904 年各年度报告加以统计,可知从各地抵达新加坡的福建人女性移民 11 年合计为 38 508 人(其中 1894 年 2 187 人、1895 年 2 470 人、1896 年 3 095 人、1897 年 2 261 人、1898 年 2 858 人、1899 年 3 070 人、1900 年 3 884 人、1901 年 3 983 人、1902 年 4 711 人、1903 年 5 058 人、1904 年 4 931 人),年均约 3501 人;福建人儿童移民总数为 54 951 人,年均约 4 996 人。他们绝大多数到新加坡,有一小部分到槟榔屿等地。福建人儿童移民总数年平均占各方言群、各国籍的儿童移民总数的一半以上,且人数占第一位(详见表 6)。

从 1891 年开始,海峡殖民地官方每隔 10 年举行一次以方言群来区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普查。根据历次的普查结果,可知 1891 年至 1911 年福建人占新加坡华人总数的百分比为:1891 年福建人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106 643 的 48%(包含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11%的侨生);1901 年福建人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164 041 的 45%(包含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9%的侨生);1911 年福建人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207 413 的 44%。在这 3 个年份里,福建人在各方言群中均占最多比例,并远远高于其他方言群。

关于 1891 年至 1911 年新加坡华人各方言群分布的具体情况,请参阅 Mak Lau Fo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 p. 120。

表 6 1894 - 1904 年各地抵达新加坡的福建人儿童移民人数

年份	福建人的儿童移民 人数(单位:人)	占各方言群、各国籍 儿童移民总额的 %	年份	福建人的儿童移民人数 (单位:人)	占各方言群、各国籍 儿童移民总额的 %
1894	2 832	58.2 %	1900	5 877	69.2 %
1895	3 890	50.5 %	1901	5 631	69.1 %
1896	4 246	55.6 %	1902	6 758	68.9 %
1897	2 782	55.8 %	1903	7 475	60.1 %
1898	4 150	66.4 %	1904	6 466	60.1 %
1899	4 844	72.8 %	合计	54 951	62.6 %

资料来源: *Annual Reports on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4-1904.*

即使在没有按方言群来区分的人口普查的 10 年之前,即 1881 年,福建人(34 508 人,其中侨生 9 527 人)的比例在各方言群中也是最多的,约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86 066 的 40 %(包含占当地华人总人口 11 %的侨生)。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 1881 年至 1911 年间新加坡福建人人数的基本情况,即 1881 年 34 508 人、1891 年约 51 189 人、1901 年约 73 818 人、1911 年约 91 262 人,4 年平均每年约 62 694 人。

结 语

福建人移民海峡殖民地的历史颇早。海峡殖民地是清代尤其晚清福建人移民马来亚的集中地。在海峡殖民地,除了 1911 年马六甲海南人比福建人略多之外,福建人所占的比重均比其他方言群多。至 1911 年,海峡殖民地的福建人总数为 142 348 人,占海峡殖民地华人总数 306 544 人的 46.4 %,占马来亚殖民地的福建人总数(未包括丁加奴州的数字) 255 984 人的 55.6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加坡福建人的数量在马来亚各邦和殖民地福建人中占绝对多数。通过对海峡殖民地华民护卫司年度报告的分析,可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福建人儿童移民数远超过其他方言群及国籍的儿童移民;从厦门港出发移民槟榔屿和新加坡的福建人绝大多数是男性移民;1893 年 9 月清朝廷正式废除海禁政策对福建人经厦门港移民海峡殖民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移民新加坡、槟榔屿的人数呈持续增长的趋势。

(本文受到厦门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育工程第三期(A 类)的资助,特此致谢)

注释:

[1][2][3] 颜清湟:《福建人在马新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见林忠强、陈庆地、庄国土、聂德宁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 页。

关于 1881 年新加坡华人各方言群分布的具体情况,请参阅(清)李钟珏著,许云樵眉批加注:《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编译所印,1947 年,第 4 页下。

清代福建人在海峡殖民的人数在绝大多数年份中比其他华人方言群多的原因似与福建人较早以商贸方式移民到海峡殖民地、福建人采取连锁移民方式移民和早期华人的方言群认同等因素有关。

笔者正在进行的研究《1786 年至 1911 年福建人向马来亚的移民》显示,1786 年至 1911 年福建人是马来亚华人的最大方言群。至 1911 年,马来亚的福建人为 255 984 人(未包括丁加奴州。该州的福建人亦占多数),约占马来亚华人总数(未包括丁加奴州) 848 534 人的 30.2 %。

- [4] 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
- [5] 永春《留安刘氏族谱》。引自林国平、邱季瑞主编:《福建移民史》,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 [6] 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麻六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5页。
- [7] 克尼尔 辛格 桑杜:《华人移居马六甲》,梁英明译,载姚楠主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94页。
- [8]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第44页;Mak Lau Fo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5, p. 81.
- [9][10] 书蠹(Bookworm):《槟榔屿开辟史》,顾因明、王旦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9、138页。
- [11][21]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44-247, pp. 248-249.
- [12][14] 钱江:《马来西亚檳城福建五大氏族与传统中国乡土在海外的重建》,载《南洋学报》(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第56卷,新加坡:南洋学会(South Seas Society),2002年12月,第151页。
- [13] Yen Ching-hwang, “Early Fukienese Migra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1900”, in Yen Ching-hwang,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p. 75-77.
- [15] 徐继畲:《瀛寰志略》卷二《南洋各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 [16] 傅衣凌:《厦门海沧石塘〈谢氏家乘〉有关华侨史料》,载《华侨问题资料》1981年第1期,第63-74页;钱江:《马来西亚檳城福建五大氏族与传统中国乡土在海外的重建》,载《南洋学报》(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第56卷,第151页。
- [17][18] 力钧:《檳榔屿志略》卷四《流寓志》,双镜庐集字板排印,出版时间不详,第7、8页。
- [19][22][23][25]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叶书德译,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第5、5、8、10页。
- [20]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4年,第5页。
- [24] W. L. Blythe, “Historical Sketch of Chinese Labour in Malaya”, *JMBRAS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0, Part 1, June, 1947, Singapore and Kuala Lumpur, pp. 68-71; Persia Crawford Campbell, *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to Countrie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Negro Universities Press, 1969, p. 1.
- [26] 王赓武:《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和定居者》,载王赓武著:《中国与海外华人》,天津编译中心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98页。
- [27]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叶书德译,第19页;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第12页;Mak Lau Fo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5, p. 81.
- [28] 柯木林:《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第86、81、206、213页。
- [29] 《厦门华侨志》编委会:《厦门华侨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 [30] 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泉州市华侨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责任编辑:乔云]

(下转第84页)

[31] 丁春林、阮文红:《越南历史上的改革》,河内:越南文化传播出版社,1998年。

[32] 潘辉梨、丁春林等:《越南封建制度史》第三集,河内:越南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492页。

[责任编辑:司 韦]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Nguyen Dynasty and Development of Sino-Vietnames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LIANG Zhi-m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Nguyen Dynasty is the important and last one in Vietnamese history. Vietnamese academia has different, and even totally opposite evaluation on its historical effects. This article holds 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Nguyen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the prophase and the anaphase. In the prophase, the country got united and the polity was relatively stable. I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in developing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various reasons for explain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guyen Dynasty. The basic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 is that long-term stability requires the rulers to cater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reform and open up, and mak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Key words: Vietnam, the Nguyen Dynasty,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上接第 74 页)

Hokkiens' Migration 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during 1644-1911

WANG Fu-bing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The Hokkiens migrated 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rather early in the history, and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were the main places where the Hokkien migrants in Malaya concentrat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 Hokkiens constituted the largest dialect group among the various dialect group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except that the number of the Hainanese was a bit more than that of the Hokkiens in 1911. The Hokkiens in Singapore had absolutely been the most numerous among all dialect groups since 1880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number of the Hokkien children migrants far exceeded that of other dialect groups or nationalities, and most of the Hokkien migrants from Amoy port were male. It was the abolition of the seafaring prohibition policy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n 1893 that had important effects on Hokkiens' migration from Amoy port 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which meant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Hokkien migrants in Singapore and Penang.

Key words: Hokkien, migrant, Straits Settlements, dialect group